



邓小平为大学题写校名

据中央档案馆记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邓小平为我国20多所大学题写了校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全国著名大学,如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括号内为题写时间,下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84年)、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198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86年)、中国矿业大学(1988年)、河海大学(1985年)、山东财经学院(今山东财经大学,1986年)、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1988年)等。

“发展高科技主要靠年轻人”

1960年2月19日至25日,担任中央总书记(当时党中央设有主席、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曾经视察安徽。23日,他来到当时安徽最为著名的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视察。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的车队徐徐驶进合肥工业大学。参观完该校的科学研究展览馆后,邓小平对学校工作非常满意,他跟校长孙宗溶说:“你们搞得不错,发展高科技主要靠年轻人,希望你们将来研究出更多的成果来。”

1979年7月,邓小平又一次视察安徽,7月16日,他再次来到了合肥工业大学,这是他19年后重访该校。看到学校一片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邓小平非常高兴。应省委和合肥工业大学领导的恳请,他兴致勃勃地挥毫为该校题写了“合肥工业大学”的校名。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他一向关注家乡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极为关心家乡的高等教育。

为迎接学校90周年校庆,

四川大学党委决定请求邓小平题写校名。报告寄给党中央,请求转交邓小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办公厅就寄来了相关的信件。邓小平于1985年4月27日专门为四川大学书写的题名,横竖四张,供他们选用。收到邓小平的题名,四川大学的师生兴奋不已,深受鼓舞。

为包玉刚捐建的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1984年10月28日,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宁波籍企业家、“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宁波。当时的宁波属于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社会经济发展和形势很好。他了解到,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10倍,而人口和香港差不多,弹丸之地的香港有多所闻名于世的大学,但是宁波居然没有一所自己的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的落后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短板。于是,他当时表示出资5000万元,投资建设一所属于宁波人的大学。12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包玉

刚,两位老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当得知包玉刚打算在宁波建立一所大学的时候,邓小平连声称赞说:“你真热心,好!好!这是件好事情。”

包玉刚当场请求邓小平为即将建设的宁波大学题写校名,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1986年10月26日,新建立的邓小平题写校名的宁波大学开学典礼在教学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原国家教委迅速协调,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五所高校对口援建宁波大学的相关科系,宁波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步入快车道。

1987年9月23日,宁波大学校长朱兆祥一行访问香港,包玉刚在环球大厦宴请他们。他还特地请来了旅港的“宁波帮”人士邵逸夫、李达三、包从兴、王剑伟等人,共商办好宁波大学的大计。以后凡是宁波大学举行重大活动,包玉刚都热情地邀请海内外



宁波籍人士参加,利用各种机会介绍和宣传宁波大学。

现在的宁波大学不仅是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而且已经跻身全国“双一流”,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学。

“镶嵌”起来的校名

1988年9月,中南财经大学即将迎来40周年校庆。校庆筹备委员会派人赴京向邓小平请求为该校题写校名。84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书房欣然挥笔题写了“中南财经大学”这六个字。

两年后,重新组建后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牌怎样处理成为一个问题——原来邓小平题写的校名“中南财经大学”还缺少“政法”两个字。于是他们从邓小平在1983年为“中国政法大学”题写的校名中撷取“政法”两个字,镶嵌在邓小平原来题写的“中南财经大学”六个字之间。现在看来,校牌上由邓小平不同时间的书法组合而成的校名字,运笔流畅,气韵生动,没有任何违和感。

(摘自《党史博览》孙守让/文)

清代“落榜生”的出路

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以光绪九年应会试考生1.6万多人来看,只308人进士及第,其录取率约为1.9%,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98%的科举考生都成落榜生。那么,清代如此之多的落榜生除了继续攻读再考外,还有哪些出路呢?

第一种是“半工半读”,这是清代科举落第者所通行的方式,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继续攻读,以待下届再考。譬如清朝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早年经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落第之后,都有一段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时光。他34岁那年才中榜,继而成为大臣、著名金石考古学家。

第二种是走捐纳之途,道光九年,34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閣中书舍

人候补”的职务。而后,他因职位之便得以系统阅读了内閣所藏的清朝开国以来的大量史事档案,开笔写《圣武记》,这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后来,怀抱忧国情怀的魏源还写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走捐纳之途的魏源,虽然落榜,但依然用所学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科举落榜生捐纳为官,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这也是晚清吏治腐败的一个病灶所在。

第三种是落榜生放弃应试之路,改弦更张,从军从政。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即是科举失意、投笔从戎的一个著名例子。左宗棠于道光十二年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而后,他凭着真才实学成了晚清重

臣。另一个例子是近代名流梁启超,他17岁中举后,“屡应会试未捷”,但“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

第四种出路是所谓的大挑。“清制,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后得赴大挑,亦入仕之一途也。”米脂人高煦以同治癸酉举人应光绪庚辰大挑,被任为教职,后历官宣川训导、榆林教授。他在《闲谈笔记》中记载:“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清代的大挑”看似给了落榜考生一个希望,但是以貌取人,实在有失偏颇。

此外,有些落榜生对于科举失望改而从事商业。譬如咸丰八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后成为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

(摘自《今晚报》狄永/文)

用经济学打开《鲁滨逊漂流记》

许多人都看过名著《鲁滨逊漂流记》,它是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写的长篇小说,主人公鲁滨逊是既独特又神奇的人物,文学家认为他是孤独的开拓者,探险家认为他是勇敢的冒险家,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打破传统的叛逆者,然而在经济学家眼里,鲁滨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人”。

在鲁滨逊这个角色被创造出的300多年里,他不仅漂流在大海上,还不断地出现在经济学的文献和书籍里,甚至还有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经济学名词——鲁滨逊经济学。鲁滨逊经济学指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期,社会分工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每个人自给自足的劳动状态,就如同鲁滨逊在小岛上的生活一样。

或许你会疑惑:一个人,一座孤岛,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学概念或原理呢?别急,今天就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鲁滨逊漂流记》。

荒岛上有什么

打开《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我们会看到,当鲁滨逊遭遇海难,独自一人漂到热带小岛的时候,陌生的环境,饥饿的身体状况,都说明事情不容乐观。为了生存下去,鲁滨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岛上的环境,寻找一切可以利用并能帮助他生存下去的“经济学物品”。

为此,鲁滨逊爬上山顶俯瞰小岛,发现了椰子树、小溪、石块等东西。接下来,鲁滨逊需要给这些物品分类,比如直接用来饱腹的椰子、解渴的溪水在经济学里属于“消费品”;长棍子之类的工具,虽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可以间接帮助他采摘椰子,这类物品被经济学家称为“生产品”。此外,鲁滨逊还把藤条编织成渔网,用石头、树枝、泥土等建造掩蔽所,这些都属于“资本品”。“资本品”是指可以被用于生产不同产品的物品。

鲁滨逊通过对小岛上资源

子太小。它们刚从遥远的地方移植山峒,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怯生生地活得提心吊胆,一遇风吹草动还不吓得死去活来?

这也是可能的。

相比之下,梓树就沉稳和醇厚得多。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刺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

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竟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看来,中国古人将木匠名为“梓匠”,将故乡名为“桑梓”,将印刷名为“付梓”,对这种梓树念念在怀,赋予它某种国粹身份和先驱地位,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可能不无关系。

我只是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有点弱智,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便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有点丢人现眼。

我家的梓园原来也是蠢园呵。我忍不住嘀咕。

的初步了解和规划,让我们搞清楚经济学里的“消费品”“生产品”“资本品”这些概念。然后,他即将开启荒岛生活。

如何在荒岛长期生存

搞清楚小岛上的物品和它们的作用后,鲁滨逊就要开始在此长期生活了。一开始,他打算靠吃椰子活下去,但他只能艰难又缓慢地徒手爬树来摘椰子,每天摘的椰子数量刚好是当天的食物量,在经济学里这就叫作“收入”。

不久后,鲁滨逊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每天的劳动量仅仅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假如自己某天生病,就会立刻面临断粮的危险。为了改变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鲁滨逊决定先饿着肚子,减少食物摄入量,这样每天就可以存下

几个椰子做储备。这个行为在经济学上就叫作“储蓄”,本质就是通过延迟满足来抵御未来的风险。

当攒下不少椰子之后,鲁滨逊又开始思考如何提高摘椰子的效率。他尝试进行“投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收集树枝做了一个杆子用来敲椰子,大大提高了摘椰子的效率,这个杆子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本品”。提高生产力后,鲁滨逊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盖房子、制作滑板等,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了。

就这样,鲁滨逊聪明地利用“收入”“储蓄”“投资”等经济学概念保障了自己在荒岛的长期生存,解决了日常的基础问题。

(摘自《知识窗》欧阳晨煜/文)

能撬动房价的宋朝藏书家族

古往今来,爱收藏书的世家大族并不少。但北宋时期的藏书家族宋绶家却有些不一样。宋绶家世代数人都曾参与皇家书籍的编撰,出了不少文学大家,甚至有三个官至宰相。他们家藏书之精良,在当时称第二其他家族不敢称第一,而规模也是并世无双,藏书达三万卷,甚至有传超过秘阁(中国宫廷藏书之处),可以说差不多当时全天下最好的书都在他们家了。

宋绶家的藏书靠的是世代承袭积累——宋绶的外公杨徽之是后周时期(中国五代时期中原最后一个王朝)的进士、非常有学问的大藏书家,被宋太宗奉为一代宗师,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去世后,那些藏书就全留给了宝贝外孙宋绶。到宋绶的儿子宋敏求、宋敏修时,宋家的藏书规模更大了。到他们这一辈,宋家每天召集子孙,分享读书心得,切磋学问,讨论怎样写字,怎么翻译。

据《宋史》记载,“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意思就是说,宋家收藏的书,每一本都要校三五遍以上,品质之精良,差错过少,选择之严苛,是市面上的书所无法媲美的。所以世人皆以宋书为善本。

这个家族中最出名的人物,当数宋绶。《宋史》称宋绶“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可见他的学问和文章

在当时都是一等一的,甚至连书法也成了官员们学习的对象,北宋书法家米芾形容“倾朝学之”。这手隽秀而劲挺的小字被称为“朝体”,直接闷杀了一干书法家。

宋仁宗赵祯小的时候,养母刘太后要宋绶写篇千字文送给她,她让宋仁宗对着这篇千字文练习书法。宋仁宗长大亲政后,赐了一个大宅子给宋家,还经常偷偷把宋绶的手札留下来藏于禁中(封建帝王所居的宫苑)。

宋仁宗赐给宋家的宅子位于东京城最好的地段,那个地方名叫春明坊,距东京内城正南门朱雀门不远。进内城就是皇宫和皇帝讨论学问,或去“政府大楼”上班,走走就到了;而要去繁华地段,也不会超过半小时。这个地段是整个东京城最有文学气息的地方,只有京城大佬才买得起,宋绶家的左邻右舍不是达官就是贵人,而他们家更是这里的“顶流”,许多读书人都想住在这附近。

为啥子? 借书方便嘛!

《曲洧旧闻》有说:“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

那些想做学问的人只好勤往他们家去或干脆就在他们家边上购置房产,于是直接撬动了周边的房价——宋家边上的房价就比别处高了一倍。这恐怕是别的藏书家做不到的。

(摘自《看天下》山人/文)

宋朝南方人怕吃面食

宋朝时期,南方人不大吃面食,有其中重要原因:是觉得面食有毒。

早在五代时期,淮河以南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达摩老祖来华传道,见到有人吃面,就上前把人家的饭碗打翻在地,喝道:“安得此杀人之物?”意思是面有毒,吃了会死人的。

达摩的故事虚无缥缈,然而在宋朝的医书里面,居然也提到了面食有毒。北宋医学名家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小麦乃世之常食之物,然经火煮而食之,其性壅热,善动风气,此甚验也。”

问题是,如果面食有毒,那么以面为主食的北方人怎么没有中毒呢? 宋朝人另有补充:“西北麦经霜雪,南方少雪,故面有毒也。”

事实上,这些说法毫无科学道理。有的南方人嘴馋,总想来碗面条换换口味,可是又怕中毒,怎么办呢? 两条对策:一、面条锅里多放萝卜汁,萝卜汁能解毒;二、多准备一只锅,把面条煮到半熟,换只锅接着煮,这样面毒就能散进汤里,倒掉面汤,只吃面条。这两条对策也很荒诞,不知道当时会有多少人相信。

(摘自《文史博览》)